



总结与新变： 《汉文典·文章典》的文体思想

李凯 王领妹

摘要: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蕴含着比较系统而丰富的文体思想。来裕恂文体概念涵括体裁、体类、语体与风格等多层含义;其文体体类观分类标准多元、分类层次清晰;其文体类型观兼顾书体与篇体;其文体价值观推崇正体、重视载道经世、追求语体的雅正及风格的刚健高远等。《文章典》的文体思想基于古代文体学而又有所推进,体现出向现代文体学演进的兆端,具有总结与新变的双重特征。

关键词: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文体思想

DOI: 10.13734/j.cnki.1000-5315.2025.0604

收稿日期:2024-03-3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原理研究”(21BZW051)、西南民族大学 2024 年四川省高等院校“双一流”贡嘎计划项目(GGZY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凯,男,四川简阳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E-mail: 1610637089@qq.com;
王领妹,女,山东菏泽人,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西昌学院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学院讲师。

来裕恂(1873—1962)《汉文典》分为《文字典》、《文章典》,其中《文章典》四卷专论文法、文诀、文体、文论,蕴含着比较系统而丰富的文体思想。既有研究主要将该著视为文话、写作学或文章学著作,对其文体论的研究也主要着眼于文体分类和风格理论^①,对于该著整体的文体思想研究尚付诸阙如。本文从文体概念观、文体体类观、文体类型观、文体价值观四方面对其进行初步探讨。《文章典》中的文体概念包含体裁、体类、语体与风格等多层含义,这既影响到其论析文体的内容和角度,也影响到其对文章构成要素和写作规律的认识;按照体裁、题材、风格、表达方式、著述形式、功用等多种标准进行文体分类,反映了《文章典》分类标准多元、分类层次清晰的文体体类观;从文章辨体和文体分类角度将文章分为“撰著之体”与“集录之体”,体现了《文章典》兼顾书体与篇体的文体类型观;对文体正变、功用、语体、风格的价值判断,反映了其推崇正体、重视载道经世的功用、追求雅正的语体及刚健高远的风格等文体价值观。《文章典》的文体思想既基于古代文体学,又体现出向现代文体学演进的兆端,具有总结与新变的双重特征。

一 文体概念观:体裁、体类、语体与风格的综合

对文体概念的认识是文体思想的基础和重要内容。要认识《文章典》的文体思想,首先需要梳理其中的文体概念的含义。据初步统计,《文章典》除了序体、赋体、问体、骈体、散体等文体名称外,还有体格、体裁、体要、体制、

^①参见:刘锡庆主编《中国写作理论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33 页;宋文《〈汉文典·文章典〉研究》,广西师范学院 2012 年硕士学位论文;朱迎平《〈汉文典〉的文章学体系及特点》,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87—488 页;蔡德龙《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 147 页。

辨体、变体、正体、专体、别体、或体、杂体等术语。《文章典》正文中涉及文体概念的“体”出现百余次,“文体”约二十次。在具体语境中,这些“体”、“文体”多指体裁、体类、语体、体格等某一方面。兹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指体裁之体:

(《文心雕龙》)类既不分,体又不备。

(《颜氏家训》)论文体出于五经,亦未能统举各体,详加讨论。

体始于宋,又名“书后”。^①

第一例指出《文心雕龙》所论体裁不全备;第二例指出《颜氏家训》所论文体是指诏、命、策、檄等 20 种体裁;第三例中的“体”专指“书”这一体裁。这几例中的“体”、“文体”都指体裁之体。

指体类之体:

而宋朱子作《〈小学〉题辞》,更为韵语,又一体也。

有记事、记物、杂记三体。

箴规类者,圣贤所以自警、警人之义,其辞质而意深,盖自古有此文体矣。^②

第一例中以韵语的《〈小学〉题辞》为“又一体”,并不是以之为独立的体裁或风格,而是指“题辞”属韵文中一类,是依据文本的音韵形式所区分的类别。第二例则是依据内容将“记”分为记事、记物、杂记三类,所谓“三体”的“体”也是指类别。第三例中的箴规类属议论篇,包括箴、规、戒等七种文体。此处所谓的“文体”是具有相近文体功用的一类文体,也是指体类之体。

指语体之体:

(刘禹锡《竹枝词》)其词稍以文语,世所称“白帝城头”以下九章是也。……后人一切谱风土者,皆沿其体。

自唐代僧徒,不通文章,以俚语俗谚,书记师说,宋儒效之,创为语录。推原其意,取乎质言,然自宋来,文人学士,每效其体,支蔓荒芜,遂不可治。^③

《竹枝词》原本“俚歌鄙陋”,刘禹锡的作品“稍以文语”,改变的并非《竹枝词》句式、格律等体裁要素,而是语体。所谓“皆沿其体”也是指沿用、效仿刘禹锡所创新的语体。第二例中的“每效其体”的“体”是指“俚语俗谚”、“质言”等贴近生活口语、质朴少文的语言体式,也是指语体之体。

指体格之体:

永乐以还,崇尚台阁体,而诗学坏矣。

南北朝来,始有四六之文,文体日益浮靡。^④

台阁体是以朝代而论的风格分类;“浮靡”也并非指四六文固有的特征,而是指南北朝时期的时代文风。此处“体”、“文体”指风格,亦即体格之体。

可见,《文章典》中的文体概念包含体裁之体、体类之体、语体之体、体格之体等多层含义,而非单指文体的某一层面。如果联系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对自南宋以来的以文类为文体的批评^⑤,即可看出《文章典》文体概念观的可贵之处。

从体裁、语体、体类、体格等方面区分文体含义的诸层面,出于论析《文章典》文体概念观的需要。当代学者对古代文体论中关于“文体”构成要素的分析虽见仁见智,但关于文体的多层含义以及各含义之间的相互联系,则有相当共识^⑥。《文章典》也注意到文体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与融合。虽然,体裁之体是《文章典》论述的重点,强调辨体、分体、建体等皆就体裁而言,但并非就体裁谈文体,而是指出体裁、体类、语体、风格等各要素的密切关系,其中

①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9 册,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617、8617、8620 页。

②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9 册,第 8620、8628、8638 页。

③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9 册,第 8661、8685 页。

④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9 册,第 8654、8676 页。

⑤ 徐复观《中国文学论集》,九州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 页。

⑥ 童庆炳指出了体裁、语体、风格三者之间的互相联系:体裁制约语体,语体发展到极致转化为风格;三者的互相融合则构成了作品整体性的韵致、风神(参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童庆炳文集》第 4 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36 页)。郭英德认为古代文论中的文体包括体制、语体、体式、体性四个层面,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种文体的审美规范(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2 页)。

论述最多的是体裁与语体的关系。在谈到具体体裁的写作要领时,《文章典》往往指出相应的或理想的语体,例如论跋“其体以简当发明为主”,议“以确切明核为工”,连珠“其文丽,其言约”^①;或是指出同一体裁的语言体式的差异,例如汉表多散文,唐表多骈文^②,六朝诏书多用偶俪,唐宋则渐用散体^③;有时也论及表达方式的不同,例如碑文以叙次者为正体,议论者为变体,叙事兼议论者又为一体^④,实也关系语体,因为叙事、议论等表达方式也分别对应一定的语言体式。《文章典》也时常指出语体与风格的联系,认为语助字、形容词、同类字等关系“文之神情”、“声情神韵”、“文势壮”^⑤,如认为“短句主劲拔”,“句法错出,语气极雄健”^⑥,又如论雄浑“字新奇,句倔强”,论新奇“假象寓言,语意新奇”^⑦,皆注意到语词、句法等语体手段会影响文章风貌。至于体类,则往往依据体裁、语体、风格等标准进行分类。

《文章典》还注意从文本整体风貌、审美规范角度辨识体裁^⑧。在讨论具体体裁时,《文章典》基本是以体裁、语体等为主,不过有时也结合作家作品描述其整体风貌。例如论尺牍、论吊文:

诸葛武侯、王右军、韩文公三家书翰,风神高远,惜武侯、右军皆小简,韩虽多大篇,而究逊于武侯与右军也。

《吊屈原文》,体如骚;《吊古战场文》,体如赋。然如赋者,则过华韵缓,易乏急切凄惻之状态,故以仿佛《楚辞》者为正体。^⑨

“风神高远”、“急切凄惻”不是尺牍、吊文本身自然具有的,并非特指某一作家或作品的风格,而是体裁、语体、风格等文体各要素的“合力”所形成的整体风貌,是建立在具体作品之上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或审美规范。这些风貌描写的目的并非仅对作家作品进行品评,而是体裁的辨析与分类——超出相对生硬的、凝固的体裁规范本身,而代之以整体性的、体验性的或感受性的方式。

这种包含体裁、语体、体类、体格等多层含义而又关注文体整体性、综合性的文体概念观,也反映并影响到《文章典》对文章及其创作规律的认识。《文章典》区分文章的“文”与“质”云:

文章之道亦然,体之辨,意之经,气之贯,辞之遣,格局之布置,声调之抑扬,篇章之铺叙,字句之琢磨,纵横驰骋,务尽其才者,皆文也。而其所叙之事,所言之物,所议之人,所论之世,所阐之理,所明之道,所彰之义,所述之情,乃质也。视其质之如何而施文焉。^⑩

“文”与“质”的区分明显不同于《文心雕龙·附会》所言“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⑪的类比,或者将“体、志、气、韵”^⑫并举。其所谓的“文”相当于“形式”,“质”则相当于“题材内容”;“文”的诸要素的融合所形成的有机整体大概相当于文体,“质”则对于文体的选择与运用有决定作用。可见,《文章典》对文体这一“形式”——包括影响其面貌的因素及与“题材内容”的关系等——有相当清楚的认识。《拟文之谬》中所云则可视作反面论述:

又若拟《骚》则“兮”、“些”满纸,无病呻吟;拟赋则宾主分篇,徒喧问答;拟李杜之诗,仅和平仄,而格调不求;拟贾董之疏,徒展篇幅,而气韵不究。^⑬

就楚辞、赋、李杜之诗、贾董之疏等作品而言,用字(“兮”、“些”)、问答、平仄、篇幅等是具有一定标志性的文体因素,不过《文章典》所重视的并非单一的“外貌”特征,而是整体的格调与气韵、至味与风神,这是源于文体诸要素而

①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9、8634、8636页。

②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34页。

③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40页。

④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24页。

⑤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05、8518、8527页。

⑥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31、8532页。

⑦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75、8579页。

⑧ 童庆炳说:“读者往往不是从文体的某一层面去感受、识辨文体,而是从作品的整体性的气脉、神怀、韵致、境界、至味中去感受、识辨文体。”参见: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36页。

⑨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0、8651页。

⑩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85—8586页。

⑪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9,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0页。

⑫ 李廌《答赵士舞德茂宣义论宏词书》,李廌《济南集》卷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16页。

⑬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700页。

又超乎其上的。也许正因如此,《文章典》非常重视写作各要素的完美融合:

文章莫先于辨体,体立而经以周密之意,贯以充和之气,饰以雅健之辞,实以渊博之学,济以宏通之识,然后其文彬彬,各得其所。^①

这实际上也是“文”与“质”、“形式”与“题材”以及作家的学识和修养的完美融合,从而达到“其文彬彬,各得其所”的理想境界。

二 文体体类观:分类标准多元,分类层次清晰

以类而论的文体分类是古代文体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根据曾枣庄的意见,体类即依据一定的标准,如体裁、题材、风格、时序等,对日益繁多的文体进行粗细不同的分类^②。《文章典》不仅兼用表达方式、体裁、题材、功用等多种标准建立文体分类体系,而且按照题材、格律、文体类型、功用、性质、雅俗等不同标准,进行了丰富的文体分类实践,同时在具体类别和分类方法上也有新变。

将众多体裁进行分体与归类是《文章典》的重要内容之一,《文体》卷即占四分之一。该卷引言着重从体裁分体和归类角度批评古代重要文体论著和总集的缺失^③,希望建立“体各类分”、“详加讨论”的文体分类体系。为此,《文章典》主要借鉴古代文体分类传统,使用大类套小类的方式:先分为叙记、议论、辞令三大类;大类之下再各分为三个次类,叙记分为序跋类、传记类、表志类,议论分为论说类、奏议类、箴规类,辞令分为诏令类、誓告类、文词类;在九个次类之下分别系以具体体裁。“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在有些体裁之下又有细分,将序、碑、状、碣、记、论、策、箴、赞、颂、表、祭文等各分为若干类别,将序、说、书等分为若干文体,等等。将众多文体依据一定标准进行归类是古代文体学的智慧,其中以表达方式和功用为依据且影响较大的是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的四分法,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不过各类之下的具体文体,《纲目》中虽然提到一部分,但是并未细分子目并加以论述。清代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序例》、陈澧然《文宪例言》等也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分类方法,不过并没有细分文体并详加讨论。元代陈绎曾《文筌》将诗赋之外的“文”之体分为叙事、议论、辞令三类,各类之下分别包括若干具体文体,共分体49种,不过限于表格的形式,各体释义、源流等论述都很简略。从这个角度看,《文章典》以三个级次包罗103种体裁,详加检讨,可谓传统文体分类的总结性成果。

在此分类体系中,《文章典》综合使用了不同的标准。三个大类、九个次类主要是依据表达方式和文体功能进行分类,103种具体文体主要依据体裁而分类。有些体裁再次细分为若干类别,分类标准则更加多样,包括题材、结构形态、语言形式、表达方式等。按照题材,将“状”分为行状、事状、逸事状;将“论”分为理论、经论、史论、文论,又以多谐词、多寓言的为“或体”;将“赞”分为史赞、杂赞、哀赞,杂赞又分为人物、文章、书画诸赞。按照篇章的结构形态,将“或系以诗,或系以歌”及名为序而实为记的序体文作为序的变体。按照语言形式,以“加以四六”、“四声八韵”、“以文体为赋”为古赋的三种变体。按照表达方式,将序分为论序、直序,将碣分为叙事、议论。对于个别文体,还依据不同标准进行两种或多种分类。依据语言形式和题材两个标准,分别将祭文分为散文、韵语、四言六言、长句短句和祈祷雨场、驱逐邪疔、吁求福音、哀伤死亡等类。碑文的分类方法更多,依据题材分为叙述行事、叙述事迹、称颂功德,新产生的去思碑、寿藏碑等也属此类;依据所施对象则有山川、城池及墓碑等十余种;依据书写位置分为碑阳、碑阴;依据表达方式和表现手法分为叙事、议论、夹叙夹议、托物寓意等。

如前所述,这种以文体的分体与归类为主、分类标准多元、以大类套小类层级形式而形成的分类体系,主要基于古代文体分类传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典》将戏曲、小说纳入了“文章”范围和分类体系。宋元以来,戏曲和小说繁兴,种类甚多,不过在总集编纂和文体分类系统中始终没有一席之地。即使著录说部之文,也多是“仍条记之旧,于小说中之演义传奇略焉”,而“章回、杂剧终为儒者之所鄙”^④。目前所见较早将戏曲和小说纳入文体分类的文体专论,是出版于1905年的龙志泽《文字发凡》中的《构思》、《体制》二章。在《构思》中,小说与传记、历

①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7页。

② 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下卷《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81页。

③ 主要包括:《文心雕龙》“类既不分,体又不备”;《颜氏家训》也未能“统举各体,详加讨论”;《文选》多有可议之处;《文体明辨》“徒从形体上观察”;《古文辞类纂》归为十三类,提供了经由文体学习古文的门径,不过赠、序、书、说等分类于义未安;《经史百家杂钞》十一类的分类“文义较密,而体裁则未之及焉”。参见: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7页。

④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3页。

史并列,隶于叙事文;在《体制》中,小说、戏文与诗歌并列,隶于美文体^①。不过,《体制》还有一种以叙事体、议论体、辞令、诗赋四分法为框架建立的文体体系,其中并无戏曲、小说。对照之下不难发现,《文字发凡》实际并未建立自有的文体分类体系,而是提供了三种分类方法,其中前二者主要是引述日本研究者的观点^②,第三种则主要是延续传统文体学的内容^③。其对小说、戏曲的摇摆态度大概源于西方现代的与中国传统的不同分类法:介绍西方文学分类时,小说、戏曲不妨在列,而谈论传统的“文章流别”时,小说、戏曲仍被排除在外。换言之,《文字发凡》并没有真正接纳小说、戏曲进入文体分类体系。《文章典》则不同,在乐府之下设立曲这一文体,而将金代北曲、元代南曲、杂剧及当时的北人小曲、南人吴曲等包括在内;在文词类设小说一体,又分为传奇、演义二体^④;并沿用刘勰“原、释、选、敷”的文体研究方法和解说思路,结合作家作品,详细论说各体的渊源流变、文体特征等。相较于《文字发凡》,《文章典》将戏曲、小说与诗、赋、辞、乐府、词等并列,使之在文体体系中有所归属,这在文体范围和文体分类方面对传统文体学有所突破,“正透露着传统文体分类学向现代转变的消息”^⑤。

《文章典》中的《文品》按照风格而分类。将诗文风格归纳为若干类型是古代文体论的悠久传统,相关论述很多,如刘勰《文心雕龙》所论“八体”,皎然《诗式》分诗歌风格为 19 类,司空图《诗品》分为 24 类,马荣祖《文颂》分文章风格为 48 类^⑥,姚鼐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类^⑦,徐凤恩《文品》分为 36 类^⑧等。这些分类虽有繁简趋向不同、种类多寡之别,不过都是一个层级上的分类,各类之间都是并列关系。较早采用大类套小类的方法对风格进行分体与归类的是刘勰,八体实分为四对,四对又是来自阴阳。受姚鼐影响,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说:“尝慕古文境之美者约有八言:阳刚之美曰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曰茹、远、洁、适。”^⑨这正是在姚鼐阳刚、阴柔二分法基础上的具体化。

《文章典》也采用二级分类方式,将风格分为 6 个大类,每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共 33 种:

- 庄重类:典雅、雄浑、崇大、闲肆、谨严、高远
- 优美类:丰润、殊丽、委婉、和易、秀美、蕴藉
- 轻快类:神妙、飘逸、平淡、潇洒、新奇、圆适、滑稽
- 遒劲类:清刚、强直、豪放、倾险、峭刻、英锐、劲拔
- 明晰类:简洁、平正、明畅
- 精致类:精约、缜密、纯粹、温厚

如前所述,古代风格类型的分类少则 2 种,多则 48 种。实际上,正如数百种文体仍不能涵盖所有古代文体一样,数十百种风格也不能涵盖所有风格种类,姚鼐《复鲁黎非书》以阴阳二端统括“品次亿万”,也是希冀达到以简驭繁的目的^⑩。因此,《文章典》这种分类的意图和意义都是明显的,即以分层分类实现化繁为简、纲举目张。这种风格分类方法一直延续至现当代,如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分为 4 组 8 种^⑪,蒋伯潜、蒋祖怡《体裁与风格》分为 3

①《龙志泽〈文字发凡〉修辞学二卷》,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126、170 页。

②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第 92 页。

③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认为,《文字发凡·体制》章中的叙事体、议论体、辞令、诗赋四分法是其试图综合运用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文体分类法。不过就具体内容来看,《文字发凡》所论主要取资于古代文体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分法,真德秀《文章正宗》已提出,此其一;除诗赋一类之外(《文字发凡》分诗赋为诗、辞、赋、风、雅、颂六类,每类的解说仅一两句,且以标举例文为主,极其简略),叙事体、议论体、辞令三类的分类法、类别名称、所系具体文体,乃至各体的排列顺序、所举作家作品、解说方式和内容等,主要依据元代陈绎曾《文筌》,时而插入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相关解说,也偶有引用《文心雕龙》,此其二。参见:霍四通《中国近现代修辞学要籍选编》,第 96 页。

④《文章典》所论“传奇”既包括唐代传奇,也包括宋、元、明、清的各类戏曲;所论“演义”既包括白话章回小说,也包括文言短篇小说集。参见: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9 册,第 8663—8664 页。

⑤蔡德龙《清文话中的文体分类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 期,第 149 页。

⑥马荣祖《文颂下》,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4 册,第 4028—4042 页。

⑦姚鼐《复鲁黎非书》,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 6,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3 页。

⑧徐凤恩《文品》,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6 册,第 5601 页。

⑨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王启源校编,朝华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65 页。按:该卷“癸亥九月”条也有相似论述:“文章阳刚之美莫要于慎、涌、直、怪四字,阴柔之美莫要于优、茹、远、洁四字。”与“乙丑正月”条所记略有不同。不过“乙丑正月”条时间更靠后,且录有曾国藩赞语,故本文引用该条。

⑩姚鼐《复鲁黎非书》,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卷 6,第 94 页。

⑪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264 页。

个级次 28 种^①,童庆炳分为 8 组 16 种^②,等等。

《文章典》中的《种类》一篇按照不同标准,将“文”分为不同种类。早在先秦两汉时期,人们就将题材内容作为认识传世文献的重要角度之一。《庄子·天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③《释名·释典艺》释《论语》:“记孔子与诸弟子所语之言也。”释《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④虽然这些说解多数并不具有体裁分类的意义,不过体现了古人从题材内容认识不同文献的自觉。唐宋之后,关于“文”或“文章”分类的论述就更多了。柳宗元分为著述、比兴两类^⑤;秦观分为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五类^⑥;宋濂分为施之于朝廷、行之师旅、托之国史、发之于性情四类^⑦;王祜分为载道、纪事两类^⑧;李东阳分为纪载之文、讲读之文、敷奏之文、著述赋咏之文四类^⑨;王棻分为散文、骈文、韵文三类^⑩。这些分类,或依据题材,或依据功用,或依据体裁,角度不同,结论各异。《文章典》则集合 6 种不同标准,分别分为若干种类:

属于体裁之种类:撰著之文、集录之文

属于格律之种类:韵文、骈文、四六文、散文

属于学术之种类: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杂家

属于世用之种类:名世之文、寿世之文、经世之文、酬世之文

属于性质之种类:理胜之文、情胜之文、才胜之文、辞胜之文

属于通俗之种类:公移之文、柬牒之文、语录之文、小说之文

如果单从体裁之体看,除了“属于格律之种类”与“属于通俗之种类”,其余似乎都与“文体”无关,不过从体类之体看,却体现了《文章典》按照题材、体裁、功用、雅俗等分类的体类观。从上文引述可以看出,《文章典》这种分类虽多有渊源,但仍有创新之处:一是集中使用多种标准,从不同角度分别分类;二是其所使用的“体裁”和“世用”、“通俗”的分类标准,前者虽是发挥章学诚、吴汝纶等人的相关论述,却明确提出体裁的标准,区分书体与篇体两种体式,而后二者则体现了《文章典》的文体价值观。

三 文体类型观:兼顾篇体与书体

从著述形式看,文体包括书体与篇体两种体式或类型。书体即图书典籍等专书之体,篇体即单篇诗文等篇章之体。从整体上看,虽然古代文体学关注篇体较多,书体相对较少^⑪,但兼论书体与篇体仍有悠久的传统。《文心雕龙》中《宗经》、《正纬》、《史传》、《诸子》诸篇所论的经、纬、史、传、诸子等都是就专书而论,《论说》篇中的论则兼有著述与篇章,而属于论的传、注等释经之体则主要是书体。《宗经》、《正纬》在“文之枢纽”五篇中,《史传》、《诸子》、《论说》在诏策檄移之前,居“叙笔”部分前三位。可见,《文心雕龙》不仅没有将专书排除在“文章”之外,而且将“体乎经,酌乎纬”作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重视史、子及“述经叙理”的论在思想和文章领域的地位,并将其纳入文章分类体系。元代郝经《续后汉书·文章总叙》所论 58 种文体,国史为书体,论、说、解、语、记兼具书体与篇体。明代谭浚《言文》对 119 种文体释名考原,从其所标举的例文看,语、集、略、编、录、纬、疏(注)、释、通等主要是书体,辨、议、评、说、对、纪、志、传、义、记、谱、图等则兼具书体与篇体。清末王兆芳《文章释》将文章分为修学之文与措事之文两类,隶 143 种文体,其中释、解、故、传、微、注、笺、义疏、口诀义、讲义、衍义、驳、音、春秋、录、诀、鉴、

① 蒋伯潜、蒋祖怡《体裁与风格》下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287 页。

② 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第 155 页。

③ 郭庆藩《庄子集释》卷 10 下,王孝鱼点校,《新编诸子集成》第 1 辑,中华书局 1961 年版,第 1067 页。

④ 刘熙撰、毕沅疏证、王先谦补《释名疏证补》,祝敏彻、孙玉文点校,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215、214 页。

⑤ 柳宗元《杨评事文集后序》,《柳河东集》卷 21,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71—372 页。

⑥ 秦观《韩愈论》,徐培均《淮海集笺注》卷 22,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51 页。

⑦ 宋濂《曾助教文集序》,宋濂《文宪集》卷 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23 册,第 421 页。

⑧ 王祜《上苏大参书》,王祜《王忠文集》卷 16,《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26 册,第 337 页。

⑨ 李东阳《倪文毅公集序》,《李东阳集》第 4 册《文续稿》卷 4,周寅宾、钱振民校点,岳麓书社 2008 年版,第 176 页。

⑩ 王棻《论文》,舒芜等编《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27 页。

⑪ 王兆芳认为,历代总集与文体论著“金就词章计篇者属意”(参见:王兆芳《文章释》,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 7 册,第 6320 页)。郭英德指出,古代文体分类更多的是在经、史、子著述之外的“狭义”的文章体系之内生成的(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 51—52 页)。这些论述表明历代总集与文体论在文体范围上趋向一致。虽然部分文体专论或专著将书体纳入文体分类和论述范围,不过所论书体数量较少,而且对于兼具书、篇二体的体裁的论述,重点往往在篇体。

细草主要是书体,义、说、论、辨、评、述、例、记、志、谱、表、纪、考、续、略、原、难、非、补、拟、甲乙论议等兼具书体与篇体。《文章释》所论以传统述学文体为主,未涵盖所有古代书体,不过就书体分体和论述来说,在我国文体学史上仍具有总结性意义。除上述著例之外,将书体包括在文体范围的论文之作还有很多,王若虚《文辨》强调“决不可失体”,就包括史书、实录等书体^①;张谦宜《菑斋论文》标举《盐铁论》为论体的代表作之一,所论外传等也可为书体^②;作为文章总集序题的《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等,在论及说体等文体的源流时也举《说文》等为例^③,在解说论、说、议、解、辨、释、义、说书等文体时,虽然多是就单篇文章而言,不过这些文体也都可以用作书体。

可见,书体与篇体实在是紧密相连的。这可能与我国古代著述形式本就是由成篇之书进而为系统之书的发展历程有关^④,也可能与宽泛且富于弹性的“文”或“文章”概念有关。不过如果考虑到我国很早便形成书籍与篇章分开的传统^⑤,而古代文体分类学却始终没有从理论上明确区分书体与篇体,那么古代文体论混融书体与篇体的情况更可能还是来自文体内部的原因,即著作与篇章、书体与篇体本就互相生发。郝经《文章总叙》中的论述就可以见出这种密切关系:

论。六经无论……《礼[论]》、《乐[论]》、《正论》、《齐物论》等皆篇第之名,未特以为文也。汉兴,贾谊初为《过秦》一篇,始以为题而立论。于是二京三国诸文士,往往著论。

语。自《论语》外……《国语》,以为《春秋》外传,特以为书之号,未尝命篇为文。后世特以为题,与问难等矣。

记。……四经,万世之大记也,而不以记为名。孔子没,诸弟子及秦汉诸儒,各为记录,如《礼记》、《乐记》……《秦记》、《史记》,皆记注于四经之后而以为名,然未特命篇为文也。魏晋而下,自史氏记录外,凡志一事,皆特为文。有序有事,亦有为铭诗者。^⑥

在书体与篇体、述学与辞章之间,文体并非凝固,而是流动的。如“论”由篇体演变为书体,“语”由书体发展为篇体,“记”则由述学延伸到辞章。诸多文体在类型上灵活地延展派生,内容功用也不断扩容,在沟通、丰富文体类型的同时,也赋予文体不断更新的生命力。

书体与篇体之间的这种密切关系也使明确二者的区别成为必要。虽然包括书体在内的宽泛的“文”体范围与同样宽泛的“文”或“文章”概念正相对应,不过著述形式的选择不仅关乎言说的语境、内容、方式、目的和个性,因而具有“辨体”意义,而且正是各个具体的选择构成了文体发展的过程,因而具有文体史意义。诸如传、记、训、论、说、辨、释、解、议、驳、义、语、言、考、问答等兼具书体与篇体之用的文体,其间的区别与联系何在?解经之体可以属文,篇章之体可以成书,反之亦然,形成这种文体生态的动因何在?篇体发展为书体以及二者之间的“流动”勾画了怎样的文体史样貌,又具有怎样的文体史意义?古代文体论中书体与篇体融而不明的状态恐怕无法圆满解答上述问题。

对《文章典》文体类型观的考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属于体裁之种类》一章以“体裁”为标准,将六经之外、晚周以来的“文章”分为撰著之体与集录之体两类:

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多以文鸣于世,虽不立体,而大要有撰著之体,有集录之体。

撰著之体,篇只一义,原于《易》、《春秋》者也。

集录者,篇各为义,原于《诗》、《书》者也。^⑦

撰著之体即书体,《撰著之文》一节所举例文主要是《史记》、《五代史》、《资治通鉴》及战国诸子、《春秋繁露》以迄《通书》、《正蒙》等史、子著作;集录之体即篇体,是“文章之士,矜事著作”的单篇诗文,汇集成书则为文集。

①王若虚《文辨》,王若虚《滹南集》卷3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0册,第462页。

②张谦宜《菑斋论文》卷3,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第3890、3896页。

③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于北山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3页;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点校,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32页。

④傅斯年《战国古籍中之篇式书体》,傅斯年《先秦学术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13页。

⑤刘永济《文学论》:“我国文学体制分类之源有二:一为梁昭明太子之《文选》,后世总集文章者宗之。一为汉刘歆之《七略》,后世总集群书者祖之。前者专主文章,其界狭。后者遍及群籍,其界广。”参见:刘永济《文学论 默识录》,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27页。

⑥郝经《续后汉书》卷66,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748、750、766—767页。

⑦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74、8675、8675页。

从具体论述来看,《文章典》的这种分类主要源于章学诚《文史通义》关于著作与文集^①、吴汝纶《天演论序》关于自著之言与集录之书的论述^②。不过他们论述的重心各有不同:《文史通义》所论旨在阐明“至战国而文章之体备”,“著述之事专”;《天演论序》重在论证“文”之于“道”的重要性;《文章典》则是从文章辨体和文体分类角度区别撰著之体与集录之体,所谓“体制不辨,而欲文章之工也,其可得哉!”^③这大概也是其将《属于体裁之种类》章置于该篇首章的原因。从文体学角度来说,这是《文章典》在文体类型分类上的推进。此后章太炎《文学略说》论“著作之文”与“独行之文”等^④,可谓这一思路的延续。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文章典》提出撰著之体(书体)与集录之体(篇体)的分类,并且重视二者辨体的重要性,但是对二者的区别与联系、适用情况、写作要领等基本没有说明,更无意建立以书体与篇体为框架的分类体系。就其分类实践来看,《文体》卷主要是体裁的分类,《物品》篇主要是风格的分类,《种类》篇则是依据6种不同标准进行的文章的分类。在这个标准多元的文体分类体系中,所论重心是《文体》卷中主要源于传统分类框架、以三个级次构建的体裁的分体与归类,至于书体与篇体的分类仅是文章分类的一种方式。就对具体文体的解说来看,在103种文体中,兼具书体与篇体的不超过12种,分别是传记类的纪、录,表志类的图、谱、表、志,论说类的释、评,警告类的问答、答问,文词类的小说,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都没有超出上文所列举的《言文》、《文章释》等。换言之,虽然《文章典》从理论上明确区分书体与篇体这两种文体类型,不过在分类实践上仍以传统为主,没有更进一步突破。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体现了《文章典》文体分类思想的历史性——产生于古代文体学集大成时期,既有所推进,又以传统为主。

四 文体价值观:关涉功用、语体、风格等不同层面

在古代文论中,关于文体的价值判断产生很早。诗言志、美刺教化说等就是有关诗歌功用的命题。关于文体地位,关于文体正变、古今、雅俗的分类,关于诗、文、词、曲界限,关于总集、别集编纂中文体的裁选范围及排列顺序等,往往也或隐或显地包含一定的价值判断。关于时代或个人风格高下、某些体裁或文体种类有用无用及有何用等论述,在古代文论中也很常见。现当代学者对文体价值问题也多有注意。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说:“吾国文学,横则严分体制,纵则细别品类。体制定其得失,品类辨其尊卑。”^⑤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提出的文体价值谱系^⑥,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指出《后汉书》列传著录传主著述次序的义例^⑦,对于理解文体的价值判断也有启示。

在先贤时哲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将《文章典》与古代文论中关于文体价值判断的论述进行比较,前者关于文体价值的判断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文体的正变、功用、语体、风格等不同方面。

其一,“古义”与体裁正变。对于体裁的变体,《文章典》是区别对待的。如认为逸事状为状的变体,蔡邕《艰誓》为誓的变体等,《文章典》都视之为流变文体现象,与正体相提并论,并没有正误或高下之分。不过对于有些变体则不然。例如序的诸多变体中,《文章典》认为赠序已经失去“序之本旨”^⑧,至于寿序、贺序、谢序等,又是赠序的变体而变本加厉。又如传的变体,包括家传、小说之属、专门之纪、郡邑之志、假托之文、设论之类、排丽若碑志者、自述其生平者、借名存讽刺者、投赠类序引者等,“虽具传体,然厕于列传中,要不足取法也”^⑨。《建体之谬》一章中更是以赠序及传记类的变体为“谬体”,几乎否定了其文体价值。对于赋、乐府、谱等体裁的变体,《文章典》虽然没有视之为“谬体”,不过行文之间仍有推崇正体而轻视变体的价值判断的意味。例如论赋及其变体: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参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2页。

②吴汝纶《天演论序》:“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参见:《吴汝纶文集》卷3,朱秀梅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

③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74页。

④章太炎以“一书首尾各篇互有关系者”为著作之文,以“一书每篇各自独立,不生关系者”为独行之文。参见:《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章太炎演讲,诸祖耿、王簪、王乘六等记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84页。

⑤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 人生边上的边上 石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95页。

⑥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绪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⑦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87—88页。

⑧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19页。

⑨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21页。

宋、齐、梁、陈,加以四六,则古赋之体变矣。逮乎三唐,更限以律……其体愈变。至宋,以文体为赋,虽亦用韵,实非赋之正宗。盖自刘、班诗赋一略,区分其类,而屈原、荀卿、陆贾,定为三家之学,殆已成为古义矣。^①

论乐府及其变体:

陈、梁而下,乐府古诗变为律、绝,是并乐府而亡之矣。唐代作新什,谓之新乐府……然如李、杜、高、岑辈所作,名为乐府,实则歌行矣。下此益入卑庸怪丽,而古义荡然。^②

论谱及其变体:

今之家乘犹以谱名,若年谱,则失古义矣。^③

对于这些变体,或认为失其本旨,或认为并非正宗,或认为名不副实,而“古义”则是主要的判断标准。所谓“本旨”、“古义”、“正宗”,其所指有共通之处,即某一体裁的传统体制“正体”所具有的题材、语体等方面的规定性。实际上,无论哪种体裁的变体对这种规定性都会有所改变,不过《文章典》并非一概否认,而只是针对上述几种体裁的变体,其原因大概与“变”的程度与方向有关:赠序、寿序等之于序,假托、投赠之传之于传,律诗、绝句之于乐府等,几乎完全突破了正体原有的规范,甚至可以视为独立的文体了;“泛泛酬赠”的酬世功用和“卑庸怪丽”等不良趋向,也在较大程度上背离了“古义”。这是《文章典》贬抑这些变体的直接原因,而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其关于文体的功用、语体、风格等价值观念。

其二,“适用”与文体类别的功用。“适用”可谓贯穿整部《汉文典》的重要标准。《文字典》中论造字、改字、字体等,也都以适用为准的。如《文章典》提出“文以适用为主”^④,以“载道”为“文之真相”^⑤,辞章繁华而不周世用的文章则仅供耳目娱玩罢了。具体说来,《文章典》追求陶情淑性、移风易俗、爱国新民的文章功用,而以“阐圣言,新国政”为“道”的内容^⑥,其中既有对传统文论观点的继承,同时也反映了现实政治社会的新变与需求,从而赋予“道”以时代特质。

这种文章价值观念反映在文体价值观上,一是以题材内容是否载道、经世作为判断价值高下的依据。在叙记、议论、辞令的三个第一层级类别中,《文章典》特重议论之文,正因其题材内容关系治世经邦、立言不朽;认为后世文集中唯经义之文、传记之文、论辩之文尚可取法,主要也是这方面的原因;以干请权贵之书、泛泛酬赠之序、宴游之记、谀墓之文等为徒占篇幅,以言天说命、吟风赋月、钩章棘句、言神述异之文为文贼,则是反面助论。应该说,这是有别于单纯以体裁为标准而直接否定赠序、词赋等的做法^⑦。

《文章典》还提出“世用”的分类标准,将文章分为名世、寿世、经世、酬世四类:

名世之文,于人情事势,揣摩推测,透彻无余。故敷陈利害……世俗见之,未有不好之深者。然其文也……可以行近今,不可以垂久远。

其为人也,出言有章,吐辞为经,一字一句,可以千载,此寿世之文也。圣明之世,陈谏纳谏,贡箴献颂,登于明堂,文章见诸措施……至于遭时不偶……立不朽之言,以俟来者。

(经世之文)故虽博若邱明,精若庄周……而文章之裨益于世者几何?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而能博闻强记、通达古今、抱济世安民之念、有民胞物与之怀者,几人哉?

酬世之文者,世俗所谓应酬之文是也。如寿文、祭文、赠序……以及谀墓之文、乡人之传……古人文集所载,无德而称之文,不可胜数。^⑧

这四类又可分为两组:前二者为一组,主要以时间为标准衡量文章行世的结果,寿世之文胜过名世之文;后二者为

①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6页。

②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8页。

③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28页。

④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95页。

⑤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7页。

⑥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9、8667页。

⑦ 方宗诚《〈尚书〉总论》认为,相对于本纪、列传、诏令等,辞赋、赠序等不过是“闲文字”(参见:方宗诚《论文章本原》,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6册,第5619页)。陈澹然编选《文宪》也以经世为主,而直接摈除词赋一门(参见:陈澹然《文宪例言》,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7册,第6806页)。

⑧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0—8681页。

一组,主要以功用为标准衡量文章的社会功用,经世之文高于酬世之文。不过这四者又有其内在联系,即行世的结果与社会功用都决定于题材内容。

二是重视小说、戏曲等文体的价值。《文章典》中对小说的论述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以演义“混以街谈俚谚之语”,将小说之文隶于“鄙俚褻秽”的通俗类文体^①,另一方面又赞叹其感人至深的艺术感染力和移风易俗的社会功用。也正是在这种矛盾处境中,更可以看出《文章典》对文章内容和功用的重视:

中国之小说,自昔之作,大约事杂鬼神,情钟男女者为多……而移风易俗之道,外国泰半得力于小说者,中国反以此而沮风气。推其原因,则由于读小说者,不知小说之功用,作小说者,不知小说之关系也。^②

由此也可以理解,以延续传统文体学为主的《文章典》,之所以会将戏曲、小说纳入文体系统,并且支持彼时正逐渐展开的论说、诗歌、小说等文体改良,“文章之妙”固然是原因之一,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出于重适用的文体功能价值观念,支持文体改良也是以求适用为目的。

其三,雅正与语体的雅俗得失。对于语体,《文章典》也有其价值尺度和判断标准。就具体体裁来说,主要是语体的雅(古)与俗(今)。在《种类》篇中设“属于通俗之种类”,“鄙俚褻秽”是重要的分类标准^③;前文提到的语录,《文章典》即不满其“俚语俗谚”的语体特征,并认为其是导致“支蔓荒芜,遂不可治”的不良文风的原因之一^④。又如论尺牍:

稽诸往古,犹以雅言,创为一体……后世俗尚日趋简陋,俚语俗字之杂出,散行骈体之并陈,勒为专书,名曰尺牍。此等文体,甚不雅驯。^⑤

往古的雅言与后世的俗尚,这类似于徐师曾提到的“体有古今”的问题^⑥。只不过徐师曾的论述中对今体——多指骈俪之语——或是指出其“秊鲜稳顺”的特征,或是表示恭敬的功用,与古体——多指散体的“深纯温厚”——似仅有古今之异,并无高下之别^⑦;而《文章典》认为后世尺牍的俚语俗字、骈散并陈,“甚不雅驯”,与古体的雅言高下立见,实含有价值判断在内。再联系《文体》篇以“风神高远”论诸葛亮等三家书翰,更可以看出《文章典》所设定的尺牍这一体裁的理想风貌;其批评并非针对尺牍体裁本身,而是不满浅陋俚俗的俗尚语体。

就文章整体来看,《文章典》以“雅健”和“正”为理想语体。关于“雅健”,从前文所引述的“饰以雅健之辞”即可看出,这里主要谈一下“正”的判断标准,即不同体裁、体类及语体类型所要求的语体规范。符合这种要求即为“正体”,否则是“失体”。这种语体价值判断在《文章典》对“文妖”的批评中体现得最为鲜明:

窃观中国文章之失矣,学子则以游辞诡论为高,学《选》则以僻字涩句为奇,学六朝则以俳词偶语为丽,学“八家”则以摹拟拟句为能。以聱牙棘舌之文为高古,以淫声乱色之文为丽则,以俚语琐谈之文为质实,以循声按谱之文为理法,不问其为俳谐,为谄读,为鄙俚,为迂疏,而无知妄作,诨语如优,俚语如市,媚语如娼,祝语如巫,百出其狰狞、谐媚、夭韶、轻倩之态状以应世。^⑧

所谓“中国文章之失”主要是就语体而言的。无论是“子”、“选”、“六朝”,还是奇、丽、质实,在语词、语法及修辞手段、表达方式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要求。选择和使用相应的语体则有助于形成理想的风格、风貌,反之则成为“文妖”。另外,诨语、俚语、媚语、祝语等语体选择,轻俗卑下,实为雅健、雅正的反面。这种语体直接通向“狰狞、谐媚、夭韶、轻倩之态状”,同样为《文章典》所痛斥。

其四,“阴阳”与风格优劣。《文章典·文品》篇专论风格,所论6类33种风格可视为对历代优秀作家作品风格的概括,也可视为对理想风格的追求。至于这些风格的反面,该篇并没有论及。梳理其他篇章关于风格的论述,尤其是不同风格的比较,更可以看出《文章典》关于风格优劣的判断。例如:

①《文章典》中所谓“小说之文”包含戏曲在内。参见: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2—8663页。

②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65页。

③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3页。

④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5页。

⑤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84—8685页。

⑥徐师曾《文体明辨序》:“又如诏、诰、表、笺诸类,古以散文,深纯温厚;今以俚语,秊鲜稳顺,谓无古今不可也。”参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78页。

⑦例如论“书记”：“世俗施于尊者,多用俚语以为恭,则启与状疏,大抵皆俗体也。”参见: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第129页。

⑧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96页。

秦虽无道,而诏令之文则伟……东汉以来,辞气衰薄矣。

东汉之文章,不如西汉之浑厚。……故宋齐伤纤巧,梁陈病刻饰……虽二者相较,南朝视北朝尤浮靡,北朝视南朝为刚贞,要皆不能厕于古文辞之列。^①

就时代、地域风格而言,以“伟”优于“衰薄”,以“刚贞”优于“浮靡”,推崇“浑厚”文风,而以“颓靡”、“纤巧”、“刻饰”为伤为病。在描述历代诗人风格时往往也有明确的优劣判断。这些描述可分为两组:

高情远韵 气骨直追西汉 孤高 流丽 寄穠鲜于简淡 势若掀雷抉电 笔力横绝
刻镂 逼迫 琐碎 颓靡 萎弱少风骨 轻俗 浮丽 谐俗 纤小 台阁体^②

对比之下,《文章典》对不同风格的倾向性是比较明显的,其所赞赏的多是刚健阔大或高远简淡的类型,而以卑弱纤仄、轻俗浮靡的类型为“病”。这种倾向性在《文品》篇的风格分类和论述中并没有表现出来。不过该篇引言中关于文品和人品一样有“阴阳二性”的论述,则可以作为《文章典》关于风格的价值判断的注脚:

属于阳者,光明正大,恢廓豁达,皎似青天,朗若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雨露,有威风祥麟之概,有生龙活虎之势,磊磊落落,英姿飒爽是也。属于阴者,依阿澳涩,回伏隐匿,纠结若蛇蚓,琐屑若虬虱,狡猾若鬼蜮,阴鸷若盗贼,诅咒若巫祝,闪烁狡变,不可方物,又一态状也。^③

虽然《文章典》也以阴阳论风格,但是与姚鼐、曾国藩所论阳刚之美、阴柔之美大不相同,反倒与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三》所说的“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④的阴阳观念和人性论似乎有着更紧密的精神上的联系。在具体论述中,《文章典》极少指出所论风格类型的阴、阳属性,也没有以此为标准对风格类型进行分类,不过可以推论:如果说上文所涉及的风格类型是就“文之优胜者”而论,那么“百出其狰狞、谐媚、夭韶、轻倩之态状”大概是极“阴”的风格类型。《文章典》指斥其为“文妖”,其中的价值判断不言而喻。

需要注意的是,《文章典》的文体价值观包含体裁的正变、体类的功用、语体的雅俗得失及风格的优劣等四个方面,不过这四者的关系并非平行,而是以适用、载道的文体功用为核心而互相勾连的。文体功用的核心地位,从前文所述的对“文之真相”的界定、对小说和戏曲的态度等,已经可以看出。四者之间的互相勾连则根源于文体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血肉相连”——特定的文体功用要求相应的体裁、语体、风格,而体裁、语体、风格等因素不仅互相影响,同时也影响文体功用的实效。《文章典》对古体、正体的推崇,雅正的语体选择,刚健、高远的风格追求,正与其对文章陶情淑性、移风易俗、爱国新民的“期待视野”相一致。

总之,文体概念观、文体体类观、文体类型观、文体价值观是《文章典》文体思想的具体内容和体现。从整体上看,《文章典》的文体思想以传统为主而又有所调整、增益、推进。明清时期是古代文体学的集大成期^⑤,而清代的最后十年也是古代文体学发生新变的时期。西学东渐的时代风潮、作者的传统学术修养和留学经历、“甄陶上下古今”的著述理念和“保存国粹”的著述目的^⑥,使《文章典》的文体思想在继承中发生新变。虽然整体上“‘集成’出色,而‘开新’不足”^⑦,不过仍然是这总结与新变时期的一个独特的“点”。站在这个“点”上,可以更好地理解古代文体学的传统与转向,其中关于文体的范围、书体与篇体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对于当下的古代文体研究仍有启发意义。

[责任编辑:唐 普]

①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40、8690—8691页。

②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652—8654页。

③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9册,第8574—8575页。

④ 《春秋繁露笺注》,董天工笺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页。徐复观先生曾考论阴阳观念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被赋予好恶的感受及董仲舒所赋予阴阳的性格等问题(参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2册,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49页)。

⑤ 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分类学·前言》,第14页。

⑥ 来裕恂《汉文典序》,《汉文典注释》,高维国、张格注释,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⑦ 朱迎平《〈汉文典〉的文章学体系及其特点》,王水照、朱刚主编《中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与展开——中国古代文章学论集》,第494页。